

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探微

张雅琨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十九世纪末,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碰撞时,口岸知识分子极力鼓吹现代性教育思想并开展实践活动,建立近代学校,推介西学,倡导留学西方和兴女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起到了“开风气之先,得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晚清;口岸知识分子;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意义

在清朝帝国没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新认识,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通商口岸是西方人活动最频繁,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冲击最大的地方,上海、广州、南京等口岸城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由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他们代表中国大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指在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人士,如王韬、郑观应、洪仁环、李善兰、沈毓桂、管嗣复等人。“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乎无影响但是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1]他们以西方文化为镜,反思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近代中国设计了一幅幅社会改革的蓝图,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中,这些人担负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值得我们关注和论析。

一、口岸知识分子自身的教育背景

口岸知识分子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都有着中学传统和西学背景。他们都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在口岸城市一带生活,因此由于口岸这个地缘因素与西方人接触甚多,体会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变革的思路。

以王韬为例,他大约从七八岁开始到十几岁止,一直在其父的严教下接受正式教育。十八岁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十八岁,以第一入县学,督学使者为秦中张筱坡侍郎,称老民文有奇气。”^[2]但在之后的考试中,王韬连连失败,也让他对科举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攻击”科举制。随后他来到上海,由麦都思聘请成为墨海书馆的执笔,在这里他通过和外国人合作,译书以及结识有识之士,对西学了解渐渐深入。到1865年,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类西化的城市已居住了16年,并一直与传教士密切共事,影响自然是明显的。他远远站在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的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他开始寻求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应对挑战。之后,王韬又开始游历欧洲,对欧洲的生活和文化现实有了具体感受。郑观应早年所受的“八股”教育只是为了应试科举,十七岁时他应乡试不第,才去上海经商。在上海他于时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处从事工役,并开始学习英语,1860年在上海宝顺洋行开始办办生涯。在与外国人的频繁接触、学习中他切实地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在《易言》中说到“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发自然,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这一点最能说明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见识。^[3]冯桂芬在1840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多年,他的治学兴趣很广泛,包括各种不同学科如语言科、数学、政治和外国事务,大约于1860年,他写了著作《校庐抗议》,李鸿章的许多大胆的改革尝试都是冯桂芬推动的直接结果,包括1863年在上海设立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而如容闳、买办唐廷枢等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他们的西学观念则更加深刻,以至于后来他们要求革新的观念更加彻底、行为更加激进。

在这种背景下,口岸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相似的经历和世界观念,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的高度相似。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几乎都愿意大胆创新、大胆开拓。口岸知识分子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西方文

化的精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这就为他们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多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民族自决的反应。在其教育思想中,比较典型的内容应属建立近代学校、派遣留学生计划、兴女学。

首先在“教育救国”的思想下,口岸知识分子们开始了他们的实践活动——建立近代学校,推介西学。以王韬为例,1886年王韬受聘为上海格致书院掌院,毕乃德形容它“虽不很成功却十分有趣,是善意的外国人和进步的中国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艰难尝试。”^[4]王韬作为掌院做得最成功或者贡献较大的是举办中国有奖征文竞赛,竞赛的方法是先由著名官员出题,然后评选提交的文章,并且少附部分奖金,获奖名单在报刊中登出。这项举措开启了学生的新思路,不再局限于旧式学堂的死记硬背,学生开始以新视角尝试评论国家之事。《北华捷报》的社论指出,一些获奖文章具有极高的水平,并称赞这项活动是格致书院在中国启蒙的最有力的工具。^[5]王韬对书院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筹集资金、聘请教员,并且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总理衙门注意到上海格致书院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1887年的著名奏折中主张修改国家考试制度,让应试者考数学。”^[6]无疑,上海格致书院影响到了之后的科学团体。另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育家马相伯也进行了教育实践,他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毁家兴学”的基础上,于1902年建立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震旦学院以“培养译才”宗旨,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为信条,学院课程分为文学、质学两科。文学即人文学科包括拉丁文、英吉利文、哲学、历史、政治等,质学即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等。由此可见,这一近代意义的课程分类摒弃了传统的教学体系,体现了一种新学精神。但是,马相伯并不主张完全舍弃或者改变中学,他也不盲目地引进西学,在他的现代教育思想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办学过程中,他规定“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或中文优而西文差,或西文优而中文差,或于各种科学有所长,临时亦可酌量录取,唯中文差者,须自认于毕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摈斥。”^[7]另外,马相伯还主张教育独立,所谓教育独立即包括了教育事务独立、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脱离政治宗教,学术独立。在震旦学院时,马相伯就明确提出“不谈教理”的原则,还有“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唯以文化为己任”^[8],即不谈政治原则。总之,在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坚持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立场,并且继承发扬先进的教育理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其次,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则以口岸知识分子容闳最为典型。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他最著名的活动就是由他发起和推进的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十九世纪末在他第二次回国之后,他便向曾国藩、李鸿章明确提出了“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选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9]。他规定,选定百二十人,年龄在十二到十四岁间,分四批留美,并派有汉文教习同往,以兼习汉文。他说“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为少年新中国。”^[10]显然这是他教育计划的核心,具有超前的意义。1870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留学生计划开始实施,由容闳经理留

学事务所,并在上海设立一所预备学校,选中的学生要在此校学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赴美留学,留学生之费用由国家摊付。在经过严格的挑选之下,1872年至1875年分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远渡太平洋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到这项开拓性的教育事业停止时,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在各种技术领域接受了实际训练。”^[11]就连清朝的一些高官也说到“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举之始,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2]容闳组织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培养了近代各条战线各种行业急需的各种人才,如我们熟知的詹天佑、唐国安等人。可以说,他开创了我国近代的留美教育制度,在经费投入、留学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以后留日、留欧的留学制度奠定了基础。

最后,口岸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兴女学的新教育思想。郑观应则提出增设女塾,提倡女学。他在《盛世危言》中的《女教》篇,批评了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观点,揭露了摧残妇女的残忍。他认为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中国应该为妇女广筹经费,增设女塾。他痛陈“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13]。他主张,“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室继之。”^[14]他认为女子要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重大,甚至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都会起巨大的作用。王韬也同样提倡女学,特别是在他游历西欧,提出了教育普及化和创立女校的主张。在西欧,他考察了英国和法国的女子教育状况,提出中国应模仿西方,给予妇女广泛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他在《救时刍议》中写到,“又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以收内助”“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15]。其中“六经”指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六学”指物理、化学、几何学等西学。由此可见,王韬主张让女子接受“中西结合”的教育,培养出色的女才。容闳也特别强调女子平等教育,他在美国留学时目睹在教育上的男女平等,对女子能在各级各类的学校上学甚为赞赏。他在一次与清廷高官的对话中说到,“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来好好的教育他们”^[16]。容闳批判了轻视女子教育的封建传统教育观,论述了女子在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儿女素质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素质方面的重要性。虽然在兴女学方面,郑观应、王韬等人的思想还有不完备之处,他们大都以为女学的目的是“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兴女学的提倡还是具有开创性的。

三、口岸知识分子现代性教育思想的意义

首先,从长期角度来说,他们的现代性教育思想从理论到些许实践挑战了当时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可谓“开风气之先,得风气之先”,人们开始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思考,对于传播新思想掀起新思潮,推翻清政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今后新学制的兴起奠定基础,为后世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从短期影响的角度来说,在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有眼界的人士或者是清政府开始变革教育方式,引进新学制,推介西学,为“混乱”的近代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各尽其事,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他们教育思想开创性和前瞻性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郑观应就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九十年代,

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试图按照西方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提出中国近代学制的设想。而王韬突破了原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将西学地位大大提高,提倡中学与西学并重,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续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源。”^[17]此皆为口岸知识分子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开创性、前瞻性的体现,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口岸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毕竟这只是一小部分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在大范围内引起波动。比如王韬主办的上海格致书院,其影响仅仅局限在上海周围地区,并且办学时间很短,留下的作用多是为后世的参考。马相伯一方面力图实现教育独立,却因天主教信仰而受制于教会,此举直接导致初具成效的震旦学院成为法国的“囊中之物”。容闳的实践活动——留学生计划,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晚清的保守主义者为了不使中国人美国化,加之清政府内部的明争暗斗,这份计划始终都受着保守主义者的控制。

最后,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他们为何没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只说明他们如何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开拓者。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开拓者,从封闭的封建国家走向世界,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做出了笈注。如今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留自己的特色、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如何继承和发扬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求实精神,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1][5][11] (美)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0、116、157.

[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 中华书局, 1959. 327.

[3] 夏元东编. 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63.

[4][6] 毕乃德. 上海格致书院: 向中国输入西方科技的尝试. 太平洋历史评论, 25. 2. 127、149.

[7] 马相伯. 复旦公学章程. 见朱维铮编, 马相伯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50.

[8] 马相伯.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 见朱维铮编, 马相伯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124.

[9][10] 容闳. 西学东渐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48、14.

[12] 曾国藩, 李鸿章. 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871.

[13][14] 郑观应. 盛世危言.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33、32.

[15][17] 王韬. 救时刍议上, 弢园文新编. 三联书店, 1998. 328.

[16] 转引自陈汉才. 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6. 41.

【作者简介】

张雅琨(1991-) 陕西西安人, 大学本科在读.

[4] 田玉秋. 浅谈如何做好高校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J]. 长春医学, 2010(8).

【作者简介】

黄晓燕(1979-) 女, 宁夏中宁人, 助理馆员, 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上接第111页)

【参考文献】

[1]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2] 付立宏, 袁琳. 图书馆管理教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3] 李春杰. 关于高职院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建设和思考[J]. 湖北大学学报, 2011(7).